

戰後中國的變局

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



1945-1949

「國共四年之內戰，此一可異之現象，實中國近代史中之『變局』也。」

本書《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根據大量檔案資料，充分參考前人著述，對此「變局」，多所發現，並作了深入的探討。

林桶法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49年是個關鍵的年代。



這年蔣介石被逼下野，這年美國發表《白皮書》，這年國共在大陸進行最後的和談，這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這年國府中心播遷來台灣。在民國的歷史上，很少有一年發生這麼多重大的事情。這些事件的衝擊，對國共政權而言，卻有截然不同的命運，行政中心，一個從歷史的名都南京遷至島上的台北，一個卻從偏僻一隅的延安，在史上的名都北京建立起新政權。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留下許多的疑問，戰後國軍具有絕對的優勢，何以短短三年多國共局勢逆轉？接收只是變局的開端，戰後許多環節都是關鍵，通貨膨脹導致人心惶惶，學生運動激起社會動盪，派系內耗、內閣更替頻繁使政局更加不穩，國軍戰役的挫敗更是導致國共易手的最直接原因。每一環節都很重要，雖不是環環相扣，卻有密切的關係，攸關此變局者應是當時主政的國民黨。

本書以國府（國民黨）為中心，瞭解戰後中國變局的重要因素。除前言、結論外，共分七章，分別就國民黨的接收問題，戰後國際及國內和平工作的努力，國共內戰特別是三大戰役的成敗分析，通貨膨脹與幣制改革，國民黨內派系傾軋，中共與地方的紛爭，「失去中國大陸」、「失去機會」等重要的課題進行討論。



戰後中國的變局

以國民黨爲中心的探討

林桶法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
(1945-1949 年)／林桶法著。 -- 初版--

臺北市：臺灣商務，2003[民 92]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05-1821-9(平裝)

1.中國—歷史—民國 34-38 年(1945-1949)

628.6

92016590

戰後中國的變局

——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年)

定價新臺幣 430 元

著 作 者 林 桶 法

責 任 編 輯 李 俊 男

美 術 設 計 吳 郁 婷

校 對 者 邱 美 雯

發 行 人 王 學 哲

出 版 者 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036 重慶南路 1 段 37 號

電話：(02)23116118・23115638

傳真：(02)23710274・23701091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E-mail: cptw@ms.12.hinet.net

網址：www.commercialpress.com.tw

郵政劃撥：0000165 - 1 號

出版事業：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登 記 證

・ 2003 年 11 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05-1821-9 (平裝)

62562000

代序

蔣永敬

流產的「和平統一」

一、前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投降，國、共兩軍爲爭奪日軍之受降，發生衝突，進而擴大爲全面內戰。中共軍作戰之勇，政府軍戰敗之慘，不見於八年對日之抗戰，而見於國共四年之內戰，此一可異之現象，實中國近代史中之「變局」也。

國、共在此之前，曾有兩次合作的歷史和長期內戰的經驗。第一次合作（一九二四—一九二七）是爲反對軍閥割據，以求中國之統一，但當軍閥倒下，中國統一在望之際，即爲爭奪政權而致分裂，繼以十年（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內戰。卒因日本之侵略，大敵當前，乃有第二次之合作（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但在取得勝利之時，又爲爭奪政權再度決鬥。四年（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內戰的結果，「國民」政權變爲「人民」政權。其間經過曲折，林桶法博士這本新著《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爲中心的探討》（以下簡稱《林著》），作了深入的探討。

《林著》根據大量檔案資料，充分參考前人著述，對此「變局」之探討，多所發現。付梓之前，

示以原稿，並囑為序。余對此一紮實之著作，難有多餘之贅言。惟近年所謂「和平統一」問題，成為台海兩岸爭持不下之焦點，此乃當年「變局」中「流產」之物也。今借此為題，以流產的「和平統一」為文以代序焉。

二、「和平統一」之呼聲

從《林著》探討的「變局」中，可以驗證一個不變的原則，即是「和比戰難」。蓋在國、共四年內戰中，曾有三次和談，均無所成。即第一次的重慶會談（一九四五年八月至十月），第二次的政治協商會議（一九四六年一月），和第三次的北平和談（一九四九年四月）。惟政治協商會議所獲致的協議，雖告「流產」，但曾一度帶來中國「和平統一」的曙光。當時美國使華特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將軍稱此協議為：「中國和平與復興之自由主義與高瞻遠矚之憲章」。當時與會者均以「和平統一」期許之，例如無黨派出席代表邵從恩發言云：

往日困難問題，未獲解決，乃至動兵，究不知為何而戰。然今日雙方既已謀定妥協辦法，則往事已矣，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倘吾人本於會議能決定和平建國方案促成團結統一，則此戰爭，乃可謂為和平統一而戰。

政府代表孫科向國民黨第六屆二中全會的報告說：

中國八年抗戰，始贏得今日的勝利，經過長期協商，始贏得今日和平統一，可以說是無數先烈的鮮血和全國同胞無數的生命財產所換來的結晶。

經由各黨派代表組成的政治協商會議，經過二十多天（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的協商，達成的協議有五大部份，即（1）擴大政府組織。（2）和平建國綱領。（3）軍事問題。（4）國民大會。（5）憲法草案。對國、共兩方而言，可謂各取所需。國民黨所需要者為軍隊的整編，儘快召開國民大會，完成制憲。前者為鞏固軍權，後者為鞏固政權。兩者尤以軍權為重要。國民政府主席及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指出：

我們既然迫切需要和平統一，則綱領中的軍事部份與軍事方案，實為鞏固和平，完成統一的最大要素。

至於中共方面的軍隊整編，自然也要依照綱領與方案，切實整編。要使全國所有軍隊，不分黨派，不分地區，都能聽命於政府。

換言之，就是要中共交槍。此乃中共生命之所繫，談何容易！

中共所需要者，為擴大政府組織，得以加入國民政府及行政院；憲草方面之國民大會虛級化，行政院為責任內閣制，省長民選，制定省憲等。此不僅可以參與中央政權，亦可保障其「解放區」地方政權。更可架空國民黨及蔣中正之權力。依中共之說：「由於這些決議（政協）的成立及其實施，國民黨一黨獨裁制度即開始破壞，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國家民主化」。如此，其軍權之保持，亦無問題矣！

概括言之，政協協議中的軍隊國家化，為國民黨所需求；政治民主化，為中共所需求。至國、共以外之其他黨派，則需黨派平等合法，藉以分享政治餘羹也。

政治協商會議之能獲致各黨派之贊同，自非偶然。蔣中正正在政協閉會詞中表示：

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著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一切的決議，確保和平團結的一貫精誠，督促我們國家走上統一民主的光明大道。

周恩來代表中共表示：

協商會議由各方面的努力與在蔣主席領導下，各項問題已獲得政治解決，使中國政治開闢一民主建設之康莊大道，樹立民主楷模。此項協議，乃各方互讓互諒精神所得之結果。但要保證其實現，不分地區，不分黨派，皆當遵從努力奮鬥。

繼政協之後，由政府代表張治中、中共代表周恩來、美顧問馬歇爾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簽訂一個整軍方案。在一年之內，整編政府軍為九十個師，中共軍為十八個師。再半年之內，政府軍為五十個師，中共軍為十個師。本協定經由蔣中正及毛澤東批准。

這一連串的成就，中國的「和平統一」確是充滿樂觀氣氛。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據馬歇爾的報告，深表滿意。對蔣中正表示：彼將盡其所能，來支持此一目標的完成。即召馬歇爾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返美述職，來促成中國的援助工作。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和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商震即有令人振奮的消息向蔣報告。魏道明報告說：「美政府對我協助問題，現經慎重考慮，除緊急救急事業如恢復交通、購料借款已在辦理外，對穩定幣制借款，原則上亦無問題」。商震的報告更是令人興奮，謂：「馬歇爾將軍回美後，杜魯門總統已深悉鈞座（蔣）之忍讓為國，苦心維持。現決計支持鈞座建一強大之新中國」。

蔣中正正在官邸召集高級官員會報，並親自出示魏、商電報說：

美方一切對我都好，我們何必予共黨以口實，予美方以不良印象。蓋我們必做到如妥協不成

功，責在共黨而後已。前已言之：寧失地，不失信，非做到不可。

三、鷹派之杯葛

但爲時不久，蔣的「寧失地，不失信」決心，就發生動搖了。究其原因，有以下數端：一爲「鷹派」之杯葛；二爲蔣中正與馬歇爾之間歧見難合；三爲政治解決之障礙。茲分述之。

鷹派對政協協議之杯葛，國、共兩黨之內皆有之。國民黨內之鷹派有稱之爲「頑固派」或「不妥協份子」。此派不僅對中共杯葛，對黨內之鴿派或「妥協派」亦杯葛之，但前者尙非主流派。

中共黨內之鷹派實以毛澤東爲首，屬黨內之「主流派」，屬於左派。其鴿派應屬右派，但非主流派。故中共左派對國、共和解之杯葛，遠較國民黨之「頑固派」爲有力也。

國民黨中之鷹派之杯葛情形，據周恩來向馬歇爾之指控，CC系陳立夫實爲幕後指導者。周之指控大要如下：

國民黨CC系曾設法將任何有關蘇聯之事與我人（中共）混為一事。

彼等指責我人依靠蘇聯，事實證明適得其反。

二月中之各項示威遊行，將各種與中共毫無關係之事均加罪於我人。

示威者經中共代表團之住屋前，一連數日，我們每人均受其辱。

國民黨二中全会彼等之企圖在推翻政治協商會議之一切決議；彼等不僅反對中共，且亦反對國民黨內主張和平民主統一之人士。

陳立夫先生雖其本人亦為政治協商會議之代表，實在幕後指導反動份子，反動政治協商會議。彼等反對王世杰、邵力子、張羣、孫科，甚至反對張治中、宋子文及翁文灝。事實上凡不屬該系統者均遭反對。

彼等欲更改政治協商之決議，尤以修改憲草原則為甚，以使憲法成為維持集權統治之物，而非民主之憲法。至於政府改組案，彼等一方面欲將國民黨贊成和平及民主者排斥於政府之外；一方面主張非國民黨而將參加政府者之名單，應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關於國民大會，彼等欲改變代表之比例。關於聯合政綱，彼等欲派官員接收共產黨所控制之地區，並禁止普選。

周之指控雖有所本，但亦不免「片面之詞」。例如周在政協會議中講到軍隊國家化時，認為中共之「人民軍」乃國家之軍隊；國軍「軍人第一」之口號，使軍人超過一切，因之「軍民關係不良」。國民黨的報紙駁之曰：「人民固然第一，但軍人負保護國家人民之責，亦應受人民尊重」。周謂國民黨CC系欲派官員接收中共所控制之地區。而國民黨方面則要求：「在其（中共）所佔區域內，首須停止一切暴行，實行民主」。中共僅向國民黨要求政治民主化，而本身則反其道而行之。至周撤清中共與蘇聯之關係，顯為向美討好也。

對政協憲草協議不滿者，不僅限於國民黨CC系，黨外人士亦有之，例如無黨派之政協代表傅斯年在協議投票前曾致函政府代表王世杰，謂「此次協商結果，將使國民黨與蔣先生於半年內崩潰」。促王退出政協並辭去外交部長，王氏不以為然。

二月十日，重慶「較場口事件」，乃國民黨CC系方治等為對抗黨外左派人士慶祝政協會議之成功而發生互毆事件。黨派間於此又起破裂矣。毛澤東乃借此做「翻案」文章。

二月十六日，東北人士在重慶遊行，對蘇聯軍隊不撤退及其在東北之暴行，大肆攻擊，散發宣言及傳單。各校學生有反蘇遊行示威之醞釀。中共發表宣言，謂國軍入東北應有限制；中共在東北之三十萬「民主聯軍」應予承認。更加激動群眾。二十一日，有學生兩萬人在重慶大遊行，要求蘇聯撤兵，反對中共割裂中國。此一自發性的行動，國民黨中之反對政協者，頗思利用此群眾心理以打擊中共及推翻黨派之妥協。政局趨於嚴重。

三月十七日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雖以全體起立方式通過了政協決議案，但鴿派人士頗受鷹派的攻擊。王世杰報告外交後，鄒魯、白崇禧、王正廷、齊世英、張道藩、黃宇人、任卓宣、胡秋原、胡健中等均以激烈之言攻擊王之外交軟弱。CC系之蕭錚主張罷免王之外交部長。蔣中正正在二中全會紀念週中指責攻擊參加政協者「缺乏黨德」，並以「互信自信」責彼等「改過」。似亦不能使彼等改變態度。部份鷹派委員叫囂之氣益張，要求罷免翁文灝（經濟部長）、熊式輝（東北行營主任）。

黨內既難「和平統一」，欲求黨外「和平統一」，更難矣！

中共方面，毛澤東之「暴力革命」立場，堅定難移。毛氏之出席重慶會談與同意政治協商，出於形勢所迫。所忌畏者，乃黨內右傾妥協主義之滋長也。國民黨鷹派反妥協之聲勢，適足助毛消除黨內之右傾妥協主義。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毛在病癒後首次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美、蔣要以統一來消滅我們，我們要逃脫」。此為毛自二月十日重慶「較場口事件」後，開始表明他自己的想法。

三月十五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更作了進一步的說明，說蔣介石有兩隻手，第一隻手是對革命者全部消滅之；第二隻手是暫時保留，以待將來消滅之。第二隻手是人們容易忘記的，「較場

口事件」以後就不忘記了。因此再度確定了「人民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方針。隨之即向國民黨公開挑戰，四月七日，重慶中共《新華日報》轉載延安《解放日報》的〈駁蔣介石〉的社論，說「蔣介石及其黨羽收復東北無功」，說他從「九一八」以至抗戰後一連串的「通敵、賣國、妥協、投降」等等行爲。此一離譜之文是由毛親自指示發表之，並印單行本廣爲散發。

蔣中正對毛之謾罵雖甚忿怒，還是能忍則忍。稍後，他告訴馬歇爾說：「《聖經》中有言須饒恕罪人應饒恕七十個七次，余所忍受已遠過此數」。馬歇爾後來也嚐到被中共謾罵的滋味，亦曾訴苦說：「此種公然謾罵及完全不顧事實之情形下，保持緘默，實感困難；然如一加否認，則每日必須否認，是誠爲一美國官員所不堪忍受之事」。

繼之，中共對於政協所議之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法之起草及國府委員名額之分配諸事，均採杯葛態度。使政府與中共間之妥協，幾不可能。此爲四月二十日左右之事也。此時中共軍隨蘇聯軍隊之撤退而攻佔長春，其態度益趨強硬。蔣對中共之態度，決定暫不再作讓步。所謂「寧失地，不失信」之決心，至此動搖矣。

四、蔣馬歧見與周之「胡纏」

蔣中正與馬歇爾之間歧見，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馬歇爾自美國回到中國時，即行發生。此時中共軍隨蘇聯軍隊之撤退而進據四平街及長春等地，並在東北各地建立政權。政府軍則進駐錦州及

瀋陽。馬氏之意，雙方應維持現狀，承認既成事實。蔣不同意。蔣以爲：

東北我軍既告頓挫，共軍氣焰猖獗，俄國必暗助共軍，以期在東北消滅我中央軍主力，進而統治華北，達成其赤化中國陰謀。……此時與共黨妥協，實無異對俄國屈服。

馬氏以爲國軍雖暫佔優勢，但難以武力統一；如望軍事勝利前，逼共方就範，亦不能根本解決。美國雖欲以全力協助中國早日富強，但中國分裂局面存在，美國無法援助；若軍事繼續蔓延，徒耗政府實力，益使中國轉弱；若政治統一告成，軍事停止，美即進行各種援華計畫。中共與蘇聯關係，彼亦了解。但如軍事擴大範圍，東亞大陸局面或將惡化，美爲避免捲入漩渦，或須撤退。馬氏意見，亦即美政府之意見也。蔣認爲：

美國對華政策與馬歇爾特使對共黨之方針，殊令人憂慮不置。美國與我國之目的相同，成敗亦復相關，故美國願予我以精神上之協助，但仍對共黨之方法，惟求妥協之一途，實屬錯誤。

兩人意見之不協，亦足顯示馬在蔣之心目中的地位，大不如前。顯與美援之變化有關。在馬氏三月間返美促成美援時，蔣氏大爲興奮，爲報「美方一切對我都好」，決心對共「寧失地，不失信」。但在馬氏離美返華之前，蔣得駐美大使魏道明的報告，知馬對借款原意，有了變化，因爲「與中共最近搗亂情形有關」。故蔣對美國「精神上之協助」，自感失望。馬氏之勸告，亦難有效矣。

馬氏感於意見不受尊重，曾向軍令部長徐永昌訴其調停之苦。謂談判以來，政府方面（指蔣）每不遵守協商條件，予共方以口實，因之以小失大，結果招致今日東北之不利形勢。徐云：國軍之進入東北，原爲接收失地，初不料共軍如此之衆（關外共軍達四十萬）與裝備之精速。馬云：「周恩來精敏異常，爲彼鮮見之人物」。意思是說中共談判的對手周恩來確是一個「難纏的傢伙」。

蔣不顧馬氏的反對，於五月十八日及二十二日先後收復四平街及長春。並且打算攻取哈爾濱。蔣氏飛臨瀋陽視察。對於逼共就範，充滿信心，亦深慶得計。他自瀋陽致電宋子文請其轉告馬歇爾說：照目前情勢，我軍進入長春，實於和平統一，只有效益，而無阻礙，請其（馬）放心。只要東北之共軍主力潰敗，則關內之軍事必易處理，不必顧慮共方之刁難與叛亂。

蔣還表示：他確有把握，中共代表必會主動請馬氏出而調停，此乃「和平統一」之唯一道路也。中共方面的反應如何呢？周恩來向馬歇爾表示：對蔣希望迅速停止衝突，恢復和平事，「甚為歡迎」。但細目及性質廣泛，無法即得延安之訓令，只能表示其個人意見；接收東北之主權所含意義，彼不明白；恢復交通，應即開始實行。蔣認為此乃「徒托空言之巧妙名詞」及其「延宕不決之慣技」也。毛澤東對周恩來等的指示是：「美、蔣要打，讓他們去打，要佔地，讓他們佔去，我們絕不能在法律上承認他們的打與佔為合法」。

中共不急，馬歇爾則甚緊張，他一再告知王世杰：如政府不停止東北軍事行動，彼將被迫退出調停。及蔣自北平返回南京，在馬氏堅決要求下，下令停戰十五天（六月七日至二十二日），以與中共商談。沒有結果。再延至六月三十日，屆期還是沒有結果。

這段停戰談判期間，周恩來的「玩弄」之術，使蔣之「和平統一」的自信，為之消失矣。當最後停戰期滿（六月三十日）的前三天，蔣集軍政要員會商。這三天的情況，參與會商的徐永昌留有日記，其六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云：

十時，蔣先生約晤，出馬歇爾轉致之周恩來對案，更證明其完全無誠意於和平。所以日言和平者，特玩弄吾人耳。

至於如何玩弄？六月二十八日的日記更清楚的記道：

連日共方提出之對案，仍係拖延政策，一味胡纏，如言蘇北、熱南某一地區可讓出，但不許另去官吏接收，且須留多少地方團隊防衛，而又說不能改變政治設施，彼此誰也不許駐兵。真是滑稽極矣！欺人到極點！

徐對周的「胡纏」術，亦頗欣賞，以爲「爭天下者，不如此如何爭得？」

面臨此局，蔣氏似乎計窮，他告訴與會大員戴季陶、鄒魯、吳鼎昌、王世杰、邵力子、白崇禧、陳誠等說：中共仍無和平誠意，決裂既不許可，延期停戰亦無必要。由於種種顧慮，只有宣布政府所希望者與共黨所要求之距離遙遠。和平之門不閉，聽候共黨之回頭云云。（徐永昌六月二十九日日記）

五、討價還價一席之爭

政協協議亟待執行者，分爲兩大部份，一爲軍事方面，包括軍事停戰、恢復交通、軍隊整編，並有具體的協定，但已進行失敗；一爲政治方面，包括擴大政府組織及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在國大召開之前，須成立國民政府委員會及改組行政院，接受各黨派人士參加。此項工作，亦如軍事方面而未成功。其關鍵，軍事方面似在中共，政治方面應在政府也。

中共之參加政府問題，馬歇爾在政協會議時，曾向蔣中正提出「臨時政府組織法」的建議：國務委員會應成立一小組委員會，國、共各派代表二人，以選拔「未曾確定之地區」（應即中共佔領區）

之行政人員。蔣記其所感云：「此為共黨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對他國政治之隔閡」。蔣氏之固執，於斯可見！

政協通過之國府委員名額為四十名，國民黨佔二十名，其他二十名分配給各黨派。中共要十名，國民黨不同意，經與其他各黨派協商，建議此二十名，以八—四—四—四分配之。即共黨八，青年黨四，民主同盟四，無黨派四。共方對此分配不滿意，要求中共十，民盟四，合為十四名，藉以獲得三分之二之否決權。政府方面建議修改條款，改為十二票可決，如此中共八，民盟四仍有否決權，中共仍不接受。至於各黨派之參加行政院，則於國府委員名額解決後，即與各黨派商討。此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於一九四六年四月間向馬歇爾之說明。

但據周恩來一月二十七日回延安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則不相同，周說：「我們要求改組政府實現三三制，國民黨同意我黨和民盟共為三分之一的名額（合計十四名），可以保證行使否決權」。

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以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周恩來、劉少奇、范明樞（或彭真，范為中共區山東省參議會議長）、張聞天等八人參加國府委員會。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等四人參加行政院。力爭周任行政院副院長。並批准了中共出席憲草審議委員會的名單。

一月二十七日周的報告，是中共參加的國府委員是十四名，即中共十，民盟四。但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是中共八名。可見中共是接受了中共八名，民盟四名的分配。此與國民黨方面之說明顯有出入。

事實上，國民黨之失信，是對政協協議憲草之修改，經由國民黨二中全會之決議，將無形之國民

大會改爲有形；將立法院倒閣權取消；省憲改爲省自治法。予中共以攻擊之口實，是說：「實質上是將政協決定的國會制、內閣制、省憲自治等基本原則完全推翻」。

中共在二月六日決定參加政府的人選，是在國、共關係和諧之時。政府如能「趁熱打鐵」，即時改組政府，不失「和平統一」良機也。中共之參加政府，也未嘗沒有誠意。例如周恩來在三月下旬還向王世杰表示：中共應於行政院佔有副院長，經濟、交通兩部長，及國防、內政兩部次長。王未答復。四月下旬，中共乃對國大集會、憲草起草、國府委員名額諸事，持杯葛態度。蓋此時中共得蘇聯之助，佔有長春，態度轉強矣。

六月三十日，兩度停戰期滿，周恩來向馬歇爾提議，願與王世杰、邵力子、陳誠等商談一些政治問題。蔣約王等三人面談，要中共讓出蘇北、膠濟路沿線、承德以南熱河地區，以及安東省之行政。周堅決不允讓出蘇北。七月三日，政府逕自決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大，蔣事先並未告知王等。顯示蔣對政治解決已無興趣了。馬歇爾說：彼已向美國務院建議，以司徒雷登（John Stuart Leighton）爲駐華大使，已獲同意。這表示他要脫身了。談判陷於僵局，國軍即在膠濟路沿線及蘇北與共軍大起衝突，戰事有燎原之勢。

從七月起，雙方進行邊打邊談，馬歇爾、司徒雷登居中調解，談條件，討價還價，例如國府委員名額問題，中共加民盟堅持十四名，政府由十二名讓爲十三名，中共非十四名不可；行政院改組和國大代表提名問題，也是爭執不下。最後第三方面出面調解，還是沒有結果。十月三十日晚，第三方面人士在孫科公館最後一次調解會中，孫向與會人員說：政府對各方之建議已充分接受，至國府之所以不能在重慶時改組，與國大之不能在五月五日召開，此種責任，不在國府而在中共，即第三方面亦有